

专题

◀ (上接3版)

了,这是先生让我随时注意衣冠整齐,注意身份,不能不拘小节。

陈先生的自述中有“因和吴晗认识,又在初期替我一个学生说了两句公道话,运动不久,就被打入扫地拔草大队”。陈先生说的那个学生就是我。那是1966年6月4日的事。陈先生仗义执言为我开脱。当天他就被人贴了大字报。此事我一直对先生感激不尽,也感到非常愧疚,给先生惹了祸。

我读研究生时,有一次陈先生对我说,他正在做《辽史补注》,还顺手从抽屉里抽出一册墨笔写的稿子。所以我知道他在做这个事,但一直到他过世我也没看见这个稿子。陈寅恪先生的序言早就发表了,这我都看过。

陈先生的这部书,有过好几次的出版机会。1940年冬,陈先生调到内迁至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金毓黼先生主持的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工作,并被聘为教授。当时已经把《辽史补注》列入出版计划。解放以后,徐特立同志曾去陈述先生家,看了《辽史补注》的稿子说:“以后我替你设法印。”这些出版的机会都没有实现,但是我觉得也是坏事变好事,这样他就可以不断修改,不断提高。这个当年要是在三台出了,或者徐特立同志给他出版了,也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越是往后,资料出得越多,他补充得也就越多。

各种迹象表明,包括陈先生自己的自述里也谈到,《辽史补注》是陈先生从1935年进入史语所就开始进行的工作,直到1992年他去世之前,



↑在云南昆明史语所结婚时的热闹场面

→1938年与夫人吴富荣摄于云南



一直从事这一工作,近六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懈。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陈先生晚年,有一天中午我去看他,见他正就着一杯白开水啃冷馒头。这样他就是这样凑合,以节约时间著书立说。《辽史补注》是陈先生用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传世之作。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向达给我们讲史料目录学,讲到辽代的时候就说,研究辽代,有冯家昇、傅乐焕、陈述三大家。最后这三大家都落在民族大学的大院里边了。冯家昇跟陈述先生都在我们民族所,傅乐焕在民院历史系,出门都抬头不见低头见。三大家里就陈述先生活得岁数大,活到了八十岁零几个月。傅乐焕先生,“文革”一起,1966年,就跳在陶然亭的湖里面自杀了。冯家昇先生1970年得心脏病去世了,六十几岁。陈先生还有一点,他不转移目标,专业范围相对集中,所以他的成果比傅先生、冯先生要多。像傅乐焕先生,先搞辽史,后来搞满族史。冯家昇先生搞辽史,后来搞回鹘文、回鹘史。陈先生基本就是抱着一部《辽史补注》一直做。

陈寅恪先生早年给《辽史补注》写的序是这样说的:“《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顾颉刚先生也曾评价说:“陈述同志所撰《辽史补注》,正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可称一代史料的总集。”这些评价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辽朝上与唐朝衔接,与五代和北宋并存,下接金朝。陈先生就用辽朝上下左右的有关史料来补注《辽史》。他说,“补者是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是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钱大昕、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例如对《辽史》中的阿保机“姓耶律氏,讳亿,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濛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这句话,陈先生注了五页。不管正面的反面的资料,全给列上。又例如,阿保机的几个弟弟,都没有传,只在《皇子表》里有简单记述。陈先生从本纪、表、志、其他列传里把这些人的零碎材料串起

来,为他们都补了传,使后人对他们可以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我们读辽史也更方便。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可以这样说,《辽史补注》是陈先生用毕生之力完成的一部传世之作,是陈先生为辽史学界留下的珍贵遗产。研究辽史的书很多,只有《辽史补注》和中华书局出的标点本《辽史》和修订本《辽史》,一两百年、三五百年以后都得有人看。陈先生这部《辽史补注》,今后有人研究中国历史、研究辽史,都是不能不翻的。我们作为陈先生的学生,有义务和责任好好宣传陈先生的功业和这部书的学术价值。

由于时空的局限,陈先生未能看到新出土的韩匡嗣、韩德威、韩德昌、韩德让、韩高十、韩迪烈、刘六符等人的墓志,没有办法把这些内涵非常丰富的资料补到《辽史补注》中去。如果以后《辽史补注》再版,我们作为陈先生的学生,有义务在这些方面略尽绵薄之力。

二

徐俊(中华书局总经理):刘先生,我请教您一个问题。从1935年开始做,到1940年前往三台,《辽史补注》应该是有个初稿了。到1975年,请顾先生写序,这个时候稿子应该基本成了。我知道的是,到80年代中后期向中华书局交稿。90年代,最起码到1997年之前,也就是中华书局搬到六里桥之前,稿子是古代史编辑室姚景安先生做责任编辑,已经开始部分发稿了。到2003年,我管历史室,这时候是他女婿周思永先生开始参加,又拿回去重新整理。直到最近才出

版。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能真正截稿,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凤翥:陈先生去世很突然,1992年1月5号。他去世前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他是看见一个墓志,就随时补到书里,不是说想着马上就要出版了就不补了。他去世之后,还留下很多他随时记录下相关内容的纸条,这是我听他大姑娘陈重说的。我问到陈先生这个稿子,她说还要整理加工。

陈重说的这些纸条,都是她和她丈夫在查,包括上台湾“中研院”查墓志一类的东西,总之是他们俩最后给定的稿。留下的好多条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能查资料,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算了。

徐俊:后来《辽文汇》改成《全辽文》也是在中华书局出的,陈先生收集的材料截止到《全辽文》出来(1981年),应该是一个比较清晰的状态了。《全辽文》出版之后,《辽史补注》还有多少新补进去的东西?这中间有好多个时间节点,除了1935年开始、1940年到三台,1971年来中华书局做《辽史》点校,相当于又做了一遍。我们问当时参加的老先生,也说他当时同时在做《辽史补注》。那么一直到80年代交稿,到90年代去世,《全辽文》作为资料汇集出版,《全辽文》出版之后这段时间,又做了多少工作?

刘凤翥:就是一直没定稿。没有下定决心交稿。

徐俊:然后资料又不断出来。我觉得他之所以一直没有截稿,还是由于资料、文献的不断发掘、收集。

苗润博(《辽史》修订组成

刘凤翥,1934年生,河北盐山人。196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此所1977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陈述教授。1966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民族研究所工作。从1983年9月任该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东北组业务组长,直至退休。在契丹文字的考释研究方面造诣深厚。



20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考察